



“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启蒙 与 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张宝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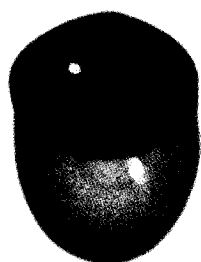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启蒙 与 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张宝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启蒙与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作 者：张宝明

特约编辑：倪为国

责任编辑：曹维劲

装帧设计：姜 明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师大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

字 数：21 万

印 数：3000 册

定 价：15.00 元

ISBN 7-80616-338-7/B·33

“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策划

逸人工作室



主持

倪为国 曹维劲



装帧

姜明 周艳梅

编者前言

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因为,所谓现代性问题,就其本质来讲,即是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引出的种种难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转换,个体身位的重新确认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

近百年来的中国同样一直被现代性问题困扰。毫无疑问,它正是在这种与传统不能割断的历史延伸中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跋涉的。唯其如此,探究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与传统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便成了本世纪和下一世纪国人特别是学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论丛正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这一主线展开各课题的研究与出版的,并特别注重原创性、当代性和批判性,以期通过这种努力,积累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提供对传

统的现代转换的建设性思路。

本论丛包括三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及专题论文选集。

1997年1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	(1)
一、共识:由立人而立国	(5)
1.1 “立人”的逻辑构成	(5)
1.2 近代以降的历史传承	(10)
1.3 时代的选择与超越	(16)
二、歧义:两股思想潜流	(23)
2.1 “不谈政治”的悖论	(23)
2.2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27)
2.3 “人”之两种导向	(32)
三、分化:渐进与革命	(38)
3.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38)
3.2 救亡:“迂远”与“直接”	(41)

3.3 不可忽视的遗题	(60)
第二章 多元与一元的抉择	(66)
一、西学东渐的震撼	(68)
1.1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视角	(68)
1.2 中西比照:文化与政治的错位	(74)
1.3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79)
二、文化维度与多元思维模式	(86)
2.1 历时性与共时性	(86)
2.2 “孔学”与“孔教”	(90)
2.3 激进与保守赘言	(104)
三、从“并立竞进”到“新的综合”	(113)
3.1 对“五四”新思路的实证	(114)
3.2 “南陈北李”的文化意蕴	(118)
3.3 革命意识的历史生成	(136)
第三章 个体与群体的紧张	(140)
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141)
1.1 与西方“文艺复兴”之比较	(141)
1.2 与西方“启蒙运动”之比较	(151)
1.3 科玄解读:理性偏至的必然	(161)
二、理性天平的倾斜(上):胡适与鲁迅	(177)
2.1 胡适:理性的早熟	(179)
2.2 鲁迅:灵魂拷打的现代意义	(186)
2.3 同途殊归的历史比较	(191)
三、理性天平的倾斜(下):陈独秀与李大钊	(196)
3.1 文化设计的自我调适	(197)
3.2 难耐的平衡	(203)

3.3 启蒙与政治的两难	(210)
第四章 提高与普及的走向	(220)
一、在“不党”与“有党”之间	(221)
1.1 新潮：启蒙思想的执着	(222)
1.2 奔流：革命意识的深化	(234)
1.3 走向：世纪末的话题	(242)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	(247)
2.1 “自由”与“解放”之争	(248)
2.2 化解紧张的思维范式	(253)
2.3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	(258)
三、在“价值”与“历史”之间	(264)
3.1 “提高”与“普及”之争	(264)
3.2 象牙之塔及十字街头	(270)
3.3 分化之再分化	(277)
结语	(285)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297)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

【提要】

《新青年》阵营自从安营扎寨的那一天起就有着文化与政治的两种不同取向,这也是后来学术界一直未能“自圆其说”的原因。但用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走向现代却异曲同工。

【关键词】 文化、政治、歧路、目的、手段。

在“五四运动”产生三周之后,其参与者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第一次将其概括成直到现在仍为人袭用的名称。此后,自 1915 年 9 月《新青年》创刊引起的一系列历史反应都被人们冠之以“五四”的头衔。然而,细说起来,“五四”的

含义并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这里首先必须正视的一个严肃学术观点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次,还必须看到“五四”作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精神事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复杂与多相。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对五四的简单化的处理,永远是一幅幅“残缺不全”的现代性解释。为此,还原、完善五四原貌,为五四精神招魂的重负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悠悠岁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话题又被学术界在世纪末的岁月中炒得沸沸扬扬。这本身也反应了思想解放后的人们对一贯“真理”的怀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循环,也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历史进步。

一则亦喜,一则亦忧。如果学术界对“五四”的观点永不过时,永远新鲜,那么我们又付出长时间的“延伸”代价。审视学术界同仁对“五四”问题的处理,不外乎两种看法,而且这两种看法有着明显的两极倾向。按照“统一”者的逻辑:“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启蒙与救亡,互相促进和结合”^①。学者们很容易将“五四”激进人士一锅煮,混淆同仁内部的思路差异^②;依从截然二分方法:“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不是一回事^③。”往往又会导致

① 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

③ 耿云志:《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五四运动与中国化建设——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陈独秀文章选编》第91页。

割断“激进派”人士前后思想发展的必然联系,甚至会演出“启蒙与救亡”相互轧轹的二律背反^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1919年为基本界线的“五四”两个阶段在根本主题上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富强与独立(救亡),但在思想手段上却大相径庭:启蒙与革命。学界同仁对“五四”前后两段关系的处理常犯一个偏颇:要么只顾主题,要么只顾主体,少有将主题的统一与主体的转换两者兼顾的全面论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五四”激进派同仁虽在台上共咏一个调子,但由于他们个性、心理素质、成长经历不同,因此又不可妄作简单的划一。看看同是当事人的胡适与毛泽东后来对“五四”的评价就可见其心衷曲。胡适说: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②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③ 而且更为重

^①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两人同样倾向于将1919年前后的运动作性质、内容、目标不同的界分。不难发现,前者的“启蒙与救亡”框架深受后者的影响,但是他们同样要面临一个两难:启蒙是“迂远”的救亡,即由立人而立国,它同后来的“革命”一样,同是救国手段和工具,何以手段将目标切断?

^②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83页。

^③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545页。

要的意义还在于：

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①

同是见证人和当事人，而褒贬扬抑如此不同：前者从文化运动角度出发说明 1919 年前后的不同；后者则从政治革命角度出发阐发两者的必然因果关系。显然，身为“政论家”和身为“政治家”的当事人本来就在价值取向上“同途殊归”。从胡适与毛泽东“情有独钟”的言论中，或许我们能隐约捕捉到这么一个信息：从一开始安营扎寨起，《新青年》的阵营就有着文化与政治的两种取向，只是当初歧义不显，尚属潜流暗潮而已。胡适当年的“不谈政治”只能是个人的一厢情愿，其实后来晚年的“口述”未尝不是一个执迷。毛泽东将“五四”前后两段在政治意义上予以串连，同以“五四运动”名之，可以说是一个反证。

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本来，它早就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直至今天，我们才开始正视。

纵视“五四”激进派的兴衰，它经历了共识、歧义、分化的心灵历程。正是这心灵三部曲的变奏，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喧闹。在前代知识分子影响下，他们在“由立人而立国”的逻辑上汇聚《新青年》阵营，并实现“人”的超越。而正是对“人”的不同取向又使两派分道扬镳。在实际倾向上，陈独秀、李大钊较近，胡适与鲁迅略同。

^①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85 年 12 月 1 日。

一、共识：由立人而立国

大凡一个团体或运动的形成必有几个思想倾向一致的盟友为造因，回首反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的壮观，大约不脱时代与个人原因的互动。

历史的车轮驰临 1915 年，中国社会有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思想文化潮流的勃兴。不难想见，那些一贯热衷于思想文化革新、靠舆论倡导改革的知识分子固然游刃有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曾经戎马倥偬、纵横捭阖、历经数次革命的政界人士也都纷纷弃武从文，改弦更张，以闭门深思显示自己的深沉。职业革命家孙中山钻进“象牙之塔”，一度重新思索中国的建设谋略，颇有思想家的冷峻、从容之风。在“不党”、不涉“政界”世风的影响下，一场以文化改造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浪潮滚滚车流。

1.1 “立人”的逻辑构成 1915 年 9 月，从辛亥革命丛林中走出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凭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经，捷足先登，一人承当了《新青年》的“揭竿”工作。《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易名《新青年》）一问世，酝酿已久的思想变革气运算是成熟，舆论界很快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可令人不解的是，一贯热心政治、不甘寂寞的陈独秀这时却一反常态，对政治斗争、武力反抗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形象。杂志创刊号上就有开宗明义的申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 而且连筹安会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 6 月等 1 版，第 82 页。

“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都不愿挂齿。这真有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信不信由你,反正人家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① 陈独秀不止一次地申述自己的思想逻辑根据:“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② 简言,要巩固共和国体,就必须从“立人”下手。

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心态在现实中的折射,基于深刻的体认的和感悟,这位亲身参加过数次政治革命的“战士”才一反常态、“痛改前非”。但是细心的同仁还会发现,在他信誓旦旦的声音背后,多少还有初衷难违的痕迹。在《一九一六》中,他那文化意蕴中包容的政治心态不时有所显露:“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世界政象,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③ 为此,他宣布自此“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④ 我们看到,尽管陈独秀文字下面深藏着政治动机,但由于他深掩其中,又加之他不涉“时政”和“不党”的双重声明,因而很容易吸引一大批仁人志士参与时代的大合唱。于是,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流的文化启蒙主义成为最嘹亮的时代强音。

按照他那“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第200—201页。

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第104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第103页。

善”的逻辑设计,他完全有理由以“立人”为起点,为国造不亡之因。陈独秀发誓自一九一六年始,与过去之历史“一刀两断”,“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这里,其所“新”之对象自个人“人格”肇始。在他看来,唯其如此,中国国富民强之期才指日可待,国人才能取得长居久安的球籍。他说:“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失其自由自尊之人格,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此白哲人种所以兢兢于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之权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① 按照这一理论,随着“独立自主之人格”的扩大,等人人自觉的“国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那人人“干预”的、“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将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怎样的逻辑概念呢?从“文化运动”到“国民运动”,再到“国民政治”的推理步骤可以发现,撇开中间具体的运作过程和自身所具的内涵。三者之间构成了联环式的因果逻辑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则成为前者的目的和归宿。瞿秋白的思想取向也有着相同的契因,他说:“真实能做改造社会的——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至于“从文化运动——新社会,中间须经的过程”必是艰巨的“国民运动”^②。不必作更多解释,“五四”激进同仁在迂回作战上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

的确,陈独秀的言行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从满怀希望到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第102—103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71页。

深深失望的心理历程。那由“立人”而立国的共识深深置根于当时的社会土壤。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史性和时代性相互激荡和酝酿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社会政象剧变,一个古老的民族在风雨中飘摇。自“辛亥”而来的仁人志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沧桑的故园之中苦苦追求着救国拯民的道路。1915年9月,《新青年》独树一帜,应运而生。带着对政界革命的真切体认,主编陈独秀以“曲线”救国的形式纵横出击。鉴于他痛下决心,因此即使在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文科学长时,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由于他身在北大,心系《青年》,以后北大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上之举,令陈独秀始未料及的是,《新青年》一改在沪上稿源不足、门可罗雀的景象,很快自负到“所有撰释,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①的地步。一个“同声相应”的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无论是留学东瀛的陈、李、鲁,还是远渡重洋的胡适,也无论是直接参予政界革命的陈、李^②,还是间接关心政治的胡、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胡适之先生在晚年口述自传中称《新青年》以前“陈先生(独秀——引者)原来就是硬派的革命人物”,算道出了陈独秀的本质特性。“五四”之前,他参加并组建过拒俄义勇队,创办过反清组织“岳王会”,加入过“暗杀团”。他一直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直接参与或大力支持者。李大钊亦是辛亥革命中极为活跃的革命青年。1907年,刚满18岁的李大钊就读于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此时他与凌铨等革命同志秘密结社,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后来又与凌铨、张良坤等人成立北方共和会革命团体。辛亥滦州之役中,他还参加了天津共和会敢死队,“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敢死队”还是“暗杀团”,陈、李不甘寂寞的革命性格实属相同。